

為胡適「平反」：兼論「胡適研究」在海峽兩岸的展望

潘光哲 近代史研究所

**廿一世紀的今天，胡適獨特的生命旅程，在海峽兩岸終於不再
是重重謎霧籠罩的歷史命題。**

胡適(1891-1962)在二十世紀中國／台灣的歷史舞台上，有著深切的影響。就中國大陸而言，195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政權主導下，大張旗鼓地以九大主題來開展「胡適思想批判」，胡適做為千夫所指的靶子，正足以顯示其影響的巨大。可是，歷經清算和批判，胡適在中國，竟然是從人們的歷史記憶裡被掃地出門的人物，處於需要自冰封已久的記憶倉庫裡逐漸解凍而被「重新發現」的局面。至於在胡適歸骨埋骸的台灣，胡適這個名字即便不是絕對的禁忌，關於他的生命旅程的整體圖象，在黨國威權體制的壓迫下，則無奈地被有意塗抹，難見青天。像是胡適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發表了大量批判國民黨訓政體制及其領袖（特別是蔣介石）的文字，也曾經是歷史研究的禁忌。海峽兩岸對於胡適的認識與理解，都面臨著現實政治的壓制。

所幸，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到了1980年代的初期，台灣的黨國威權體制被迫開始走向形式崩解的道路。以嚴謹的學術規範為基礎，引據直書，無所忌，無所諱的「胡適研究」，方始問世。台大歷史系教授與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現歐美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張忠棟的研究業績，則是這個新開拓的學術領域的先導者與示範者。張忠棟依據當時新始問世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主要是三大冊的《胡適來往書信選》——重新勾勒胡適在外交與政治方面的活動和意見，對許多由於政治因素而致諱莫如深的課題，則秉史家如椽之筆，直書無忌。張忠棟並且追源窮末，為胡適、雷震與殷海光這些前一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艱苦寂寞的生命旅程，勾勒出清晰的軌跡。他費心耕耘，最後集結成《胡適五論》與《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兩部專書（後者因絕版之故，

於1998年增訂改版，添加兩篇文章：描摹夏道平與殷海光交誼的〈夏道平與殷海光〉、悼念傅正的〈永遠活在衆人心中〉，更易書名為《自由主義人物》，再度問世），為深化這個課題的研究，奠定了深固的基石。可以說，台灣「胡適研究」的「復興」浪潮裡，張忠棟的研究，實位居新起浪頭的第一波。

在中國方面，胡適是「大批判」的黑名單上的要角，1955年以後，連當年與胡適有過師生之誼，都是項可以被鬥臭鬥倒的罪名。因此，即使那兒的「胡適研究」從1980年代末期也慢慢地出現「復興」的趨勢；但是，彼岸為胡適戴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總是沒拿掉。這樣一來，許多關於「胡適研究」的成果都先天地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往往呈顯出一幅被扭曲地詭異之至的「胡適形象」。好比說，在1930年代日本步步進逼的困局裡，胡適與友朋創辦《獨立評論》，企望「言論報國」。但是，如果把這分刊物的言論立場解釋為「完全是國民黨當局的統治思想，暗合蔣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針，而失去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獨立意識」，又說胡適在台灣的晚年歲月裡，「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唯蔣家父子之命是從，見蔣家父子臉色行事，甚至有時公開扯去了蒙著的『自由主義』的面紗，明目張膽地與蔣介石站在一起」。諸如此類把胡適描寫為「蔣氏家臣」，將之列為墮落為既存政權首腦的「文化御林軍」的知識分子成員之一的「史筆」，除了履踐某種「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功能之外，還有些什麼別的意義嗎？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胡適獨特的生命

旅程，在海峽兩岸終於不再是重重謎霧籠罩的歷史命題了。早在1980年代初期的台灣，以張忠棟的研究成果為前導，台灣的「胡適研究」，已然揭穿黨國威權體制一貫「英明偉大」的真相，從而讓讀者得到了可以跳脫出政治神話囚籠的思想刺激。至於中國方面，要到2003年的秋天，以北京大學舉行的《胡適全集》出版暨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為象徵，胡適才得到了來自官方的「平反」，走出了歷史的陰影。

2003年9月18日，在北京大學的英杰交流中心舉行了「《胡適全集》出版暨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等政府單位要員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許嘉璐公開表揚胡適不僅是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歷史的一代偉人；北大校長許智宏也致詞講演，宣稱胡適是中國大學發展方向新理念的第一人。已經92歲高齡的北大教授季羨林，曾與胡適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坐著輪椅來到現場主持會議，更深具學術薪傳的意義。在中國，胡適，不再是個禁忌了。當年胡適面對大規模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展現了他一貫的「樂觀」估計，認為自己的思想子遺，「一個治學運思的方法」，在中國大陸仍是薪火相傳，不乏後繼之力。歷史，證明了胡適的「樂觀」。

同時推出的《胡適全集》，則是安徽教育出版社為胡適的「平反儀式」獻上的一束馨香。這套《胡適全集》規模空前，除了收錄胡適生前發表、公開出版的著作（如《胡適文存》）之外，還自海內外輯錄了許多種未刊遺

稿，全書44卷精裝本，總字數逾2000餘萬，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文化名人著述規模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遺憾的是，在環境的限制下，這套《胡適全集》並未收錄胡適大量的「反共」文字，還是套「不全」的全集，誠屬白璧之瑕；但它做為「胡適研究」得以深化的基礎工程，卻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以胡適的生命史為對象，讓人得以貪婪地閱讀各種文獻，窺視其間無限風彩，並且可以得到「走出神話國」的思想刺激的時代，好似已經降臨。既然思想觀念的禁區不復存在，文獻資料又大量出土面世，在「胡適研究」的領域裡，人們當然可以邁開大步，開展漫無邊際的「知識探險」活動。

可是，歲月悠悠，浪起潮落。已然步入新世紀的此際，身為「胡適研究」的弄潮兒，面對著胡適的生命歷程從來不曾面對過的錯綜複雜的現實，我們還需要從他那兒找到省思當代中國／台灣未來進程的那一種答案？在開展／面對「胡適研究」的心智探險工作的時候，為什麼「胡適研究」擁有應當／如何成為一個學術領域的可能性？「胡適研究」匯集而成的歷史圖像，如何可能為我們自身進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資源」？「回到胡適」！是筆者的初步結論。

「回到胡適」，不是意謂著對他的生命旅程提出某種「根本」的解析，或是進行「玄學化」的遊戲。畢竟，歷史的認識永遠不會與歷史事實本身相合，史學工作者得面對的挑戰，不是類似於「後殖民批判／論述」這樣

的理論架構，也不是歷史哲學家建構的宏觀「歷史心靈」，而是如何窮搜深究具體的史料，以儘可能地逼近胡適這個人的具體存在而又多樣複雜的歷史事實，「還胡適一個本來面目」。

因此，如何盡可能地掙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從而恰如其分地形塑出胡適的遺澤所在，藉以助益於我們對前此歷史發展跡向的理解，奠定瞻望未來方向的根基，必定是有意涉足於「胡適研究」領域的學術工作者無可推卸的挑戰。「胡適研究」的無限天地，正等待著廿一世紀的後來者施展身手，持續奮力以進。